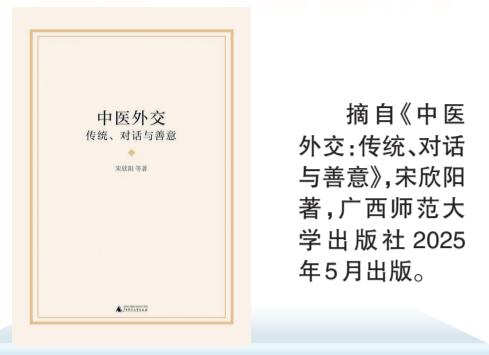


# 中医外交与全民健康覆盖



摘自《中医外交:传统、对话与善意》,宋欣阳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面的药物安全性和经济学评估,以及对执业人士实行严格的资格认证。首先,“顶层设计”一系列评估方案,筛选最易融入当地社会的药物与治疗手段。同时,对于各大型私人医疗保险公司进行调查,与当地政府沟通并向其建议合理的传统医学方案,即从私人保险公司入手,利用官方力量定制中医药物与治疗的方案。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给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充足的发挥余地。私人定制的目的不是强制融入,而是在于展现优势,作为发挥中医药市场导向力的第一步。

涵盖中医药的保险方案的推出,恰恰契合民众开始寻找新的健康治疗手段的意愿,有利于吸收更多的中医药消费者,反向推动保险公司获得更高的收益,实现双赢。对渴望通过中医药减轻医疗负担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通过私人定制设计保险方案为中医药在该国的发展打开新的局面。随着中医药受众不断扩大,“私人”转向“官方”,同样指日可待。私人定制还有利于中医药纳入整体的国家医疗保险体系,直接为全民健康覆盖贡献力量。

## 3. 非洲国家——以中医药完善国家健康保障体系

在整体卫生条件较差的非洲地区,国家健康保障体系仍旧存在很大的缺口,并伴随着恶性传染疾病流行等问题。中医药援非对于该地区疟疾、艾滋病的治疗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医外交在非洲既能发挥卫生外交的作用,又具备公共外交的影响力。同时,传统医药在非洲地区实为较易获得的治疗手段之一,可及性高且价格低廉,利用这一优势,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医保,有利于完善国家健康保障体系,对进一步改变非洲地区的卫生现状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研究可纳入医保体系药物名单的同时,将非洲

当地特色传统药物进行分类研究,因地制宜发挥中医治疗原则,也有利于拓宽传统医药的合作视野。

## (二)重视中医药援外医疗

全民健康覆盖另一个十分重要的要素在于“卫生人力”。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卫生工作者数量不足且获得教育不充分威胁着所有领域的卫生保健工作。中医药援外医疗,可以在卫生资源不足的地区派遣我国优秀的中医药人才。

### 1. 援外医疗队

中国援外医疗队在政府指导下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各医院选派具有主治医师以上资质的骨干组成,不仅在业务上技术一流,更能够根据受援国家的具体情况适应不同的实际需求。在主治医师制的影响下,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医生只能通过志愿者、民间社团或无国界组织的形式参与国际援助。除了常规援助项目,还可以有计划地打出“中医牌”,比如,充分发挥中医简、便、廉、验的特色在发展中国家占得先机,在关节疼痛、慢性溃疡、偏头疼、脑血栓等西医疗效不佳的领域,用疗效和口碑打开当地的中医药市场。除了在对外援助中践行中医特色诊疗技术,更要帮助当地建立中医思维模式的培训体系,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扩大中医药在时间跨度上的影响力。再者,可拓展援外合作领域。在传统医学保护、药用植物研究、中药开发及生产、中医药贸易、合作办中医医院和中药厂等多方面尝试与当地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优势互补,不断扩大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 2. 中医药海外中心

中医药海外中心的建设一直是我国中医药发展战略中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医外交中的重点任务。2019年4月,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工作的通知》中提出,鼓励通过多元化投入模式开设中医药海外中心。2016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提出探索建设一批中医药海外中心。中医药海外中心作为中医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成果,在我国对外交往中的特殊性及代表性不言而喻。它既代表了我国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始终如一的关注,也是中医作为国家文化瑰宝的实体呈现。

目前,有十余家中医药海外中心已经揭牌运行,还有很多正在筹建。近年来,关于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的研究层出不穷,如何将一个兼具医疗作用及文化影响力的海外机构良好运营,尚处于探索阶段。中医药海外中心对中医外交的重要作用仍有待继续开发。我们应当尽力拓展中医药海外中心“六位一体”的创新功能,极力发挥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影响力及服务当地医疗的作用,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特长,加强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传统医学科研合作,完善当地中医药教育体系,努力发展当地中医药产业,宣传中医药文化。同时,利用中医药海外中心,在执业准入、法律法规、纳入医保等方面实现突破。



《天津科技创新策略与思考》,赵绘存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10月出版。

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浪潮中,如何为一座城市量身定制科技创新的“作战地图”?由天津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赵绘存领衔编著的《天津科技创新策略与思考》,正是这样一部应时之作。翻开这本书,仿佛展开一张天津科技创新的全景图与路线图。在系统研究津门科创的专著尚显稀缺的当下,本书以“形势—区域—产业—要素—赛道”为脉络,深刻剖析了这座北方工业重镇如何扬长避短、重塑创新动能,其前瞻思考与实践路径,不仅为天津,也为全国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津门方案”。

第一,它构建了清晰而有力的战略骨架。赵绘存团队以“五大创新之路”为核心——国际化、京津冀协同化、制造业特色化、策源化与改革创新——精准锚定了天津在宏大发展格局中的独特坐标。书中深刻指出,天津必须紧握“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产业基石,深挖“制造业立市”的禀赋优势,同时深度融入京津冀这片创新沃土,避免在协同中迷失自我。这一分析跳出了“唯技术论”的窠臼,将城市功能、产业根基与区域协同巧妙融合。例如,书中揭示的京津技术流动“北强南弱”现象,宛如一道待解的难题。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打造“石家庄—保定—廊坊—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制造业创新发展带,以“产业共链成群、产业特色成势”的思路破解“虹吸效应”,战略设计的精准性跃然纸上。

第二,它勇于直面痛点,是一份不回避矛盾的“诊断书”。在“产业篇”与“企业篇”中,作者犀利戳破了三大现实困境:一是龙头缺失与生态短板:相较京沪苏,天津的领军企业身影稀疏,创新链存在“断链”隐忧(如生物医药研发卡在中试环节),产业集群根扎得不够深;二是要素错配与机制瓶颈:人才政策吸引力不足、科技金融“重租赁轻风投”、产学研合作常被“最后一公里”绊倒;三是转型渴望与能力鸿沟:众多企业仍在工业2.0/3.0阶段徘徊,面对智能化升级既迷茫又缺乏足够支撑。面对这些沉甸甸的考卷,书中提供了极具颗粒度的“破题之策”:以“链式思维”为轴心,推动政策链、产业链、跨域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文化链“七链融合”,为天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尤为可贵的是,这些源于深度调研的洞见(特别是对产业、园区、平台、赛道的分析)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并直接应用于津沽大地的科创实践,彰显了其沉甸甸的决策分量。

第三,它对创新载体的描绘充满洞见,点亮了“筑巢引凤”的明灯。作者敏锐捕捉到“科研社区”(如波士顿肯德尔广场)作为全球科创高地核心标志的趋势,进而提出天津“生态驱动”的载体布局方略。他们勾勒了“大学科技园创新集聚区”的蓝图——以大学科技园为纽带,有机串联高校、政府、企业、中介,形成知识创造、成果转化、企业孵化的“热带雨林”式生态圈。它不仅呼应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科教融汇”精神,更通过“创新共同体”模式,实现了载体、产业、空间的协同跃升,为科教资源丰富的城市提供了生动范本。

同时,面对“新基建”“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浪潮,本书展现出眺望未来的“望远镜”视野。“赛道篇”深入剖析天津在信创、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潜在优势,提出三大关键行动:以“新基建”筑基,依托超算中心、信创生态,打造算力高地与数据枢纽;以场景创新赋能,借力“港口+制造”闭环、培育智能驾驶、智慧港口等国家级示范场景;以集群思维育链,聚焦“中国信创谷”“细胞谷”等主题园区,推动产业“精深”而非“泛化”发展。书中还特别预警了“技术归零效应”对就业的冲击,体现了科技伦理与社会治理并重的系统观。

诚然,本书在提供丰富洞见的同时,也留下一些可深化探讨的空间,如对海量中小科技企业更普惠、易得的支持路径(如共性技术平台、低成本空间),以及如何激活风险投资、科创板等多元融资渠道满足企业不同阶段需求。面对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天津如何锻造更具韧性的创新链,策略深度或可再加强。

然而,这些细微的留白,丝毫不能掩盖本书的核心光芒。

它是一份精准的“诊断书”:基于扎实调研,清晰揭示天津科技创新的深层症结(龙头缺失、要素错配、载体能级等),让决策者和实践者能“对症下药”。

它是一套实用的“工具箱”:提供了“五大创新之路”战略、“双核驱动”载体布局,以及梯度培育、场景驱动、科技特派员等大量可落地的“施工图”。

它是一声响亮的“动员令”:字里行间激荡着天津依托科技创新重振雄风、重塑北方经济重镇辉煌的坚定决心。

《天津科技创新策略与思考》是一部根植津沽大地、饱含实践智慧的力作。它不仅深刻剖析了天津创新的现状与挑战,更提供了系统、务实、前瞻的破局之道。对于关注天津未来、投身科创事业的政策制定者、管理者、企业家和学者而言,这本书无疑是案头不可或缺的智慧导航。当海河之畔的创新引擎加速轰鸣时,这本书所提供的思考与策略,正悄然融入这座城市的创新节奏之中。

(作者为科学技术部新质生产力促进中心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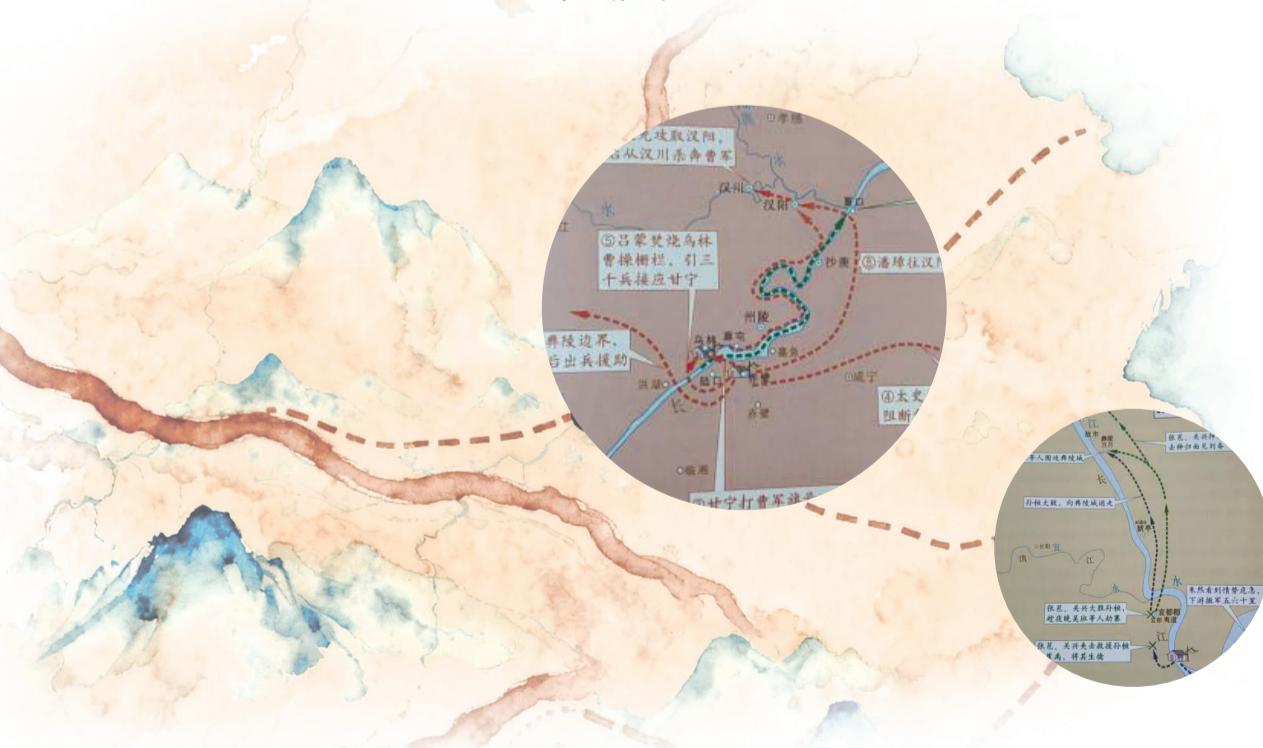
丁明磊

立足津门谋创新  
擘画科创创新图景



# 地图是读懂《三国演义》的钥匙

许盈清 马宝记



赤壁大战结束,周瑜领南郡太守,辖十七城:江陵、巫、秭归、中卢、编、当阳、华容、襄阳、郡、宜城、都、临沮、枝江、夷道、夷陵、州陵、很山。

地图中襄阳、中卢、郡、宜城、都、编,一直在曹操手中,

不可能借给刘备。

州陵;在陆口东北,属东吴昌郡,也没有到过刘备手中。

无法考证的沿江两城:巫和秭归。

所以,东吴能借给刘备的“荆州”最多不过十个城,也就是说,东吴借给刘备的荆州,仅南郡一角,即借荆州是虚,借半个南郡是真。但江陵地位极其重要,扼长江而制荆州,以至于《三国演义》中常称江陵为荆州。

可以说,地图是读懂《三国演义》的一把钥匙。

然而绘制《三国演义》地图,却是难度如同登蜀道。不仅要熟读《三国演义》内文,而且三国时代距离今天已经

1800多年了,当时的地名很多与现在不一样,绘制时先要考证多达1100多个地名,再以《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作底图,绘制出240多张地图,同时,还要考证小说中的一些地理信息是否正确。

比如,鄱阳湖三国时名为彭蠡泽,在九江段长江的南北。因公元421年大地震,都昌县一带被冲出一条河流,江水涌入鄱阳郡,逐步形成鄱阳湖。孙权将治所移到柴桑(今九江),是为扼守彭蠡。周瑜训练水军不在鄱阳,而在彭蠡,这是罗贯中的地理错误。

无论过程多么艰辛,当这套书终于问世,我满怀欣喜地期待它能为更多人打开理解经典的新视角,带来启发与收获。

(许盈清,上海大学特聘教授;马宝记,许昌学院教授、中原科技大学教授)

江北仅南阳郡,一直为曹操占领,与借荆州无涉。江夏被长江分为两部,江北为曹操所占,文聘管治。江南为孙权所有,程普为江夏太守,治沙羡,也与借荆州无关。至此仅剩南郡。